



苏轼全集

[宋] 苏轼 著

傅成穆 标点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苏 轼 全 集

(全三册)

[宋]苏轼 著

傅 成 穆 传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75.875 插页 15 字数 1,900,000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00

ISBN 7-5325-2537-6

I·1285 定价: 109.00 元

前 言

苏轼是宋诗的奠基者，词体解放的开山人，又是散文领域中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最杰出代表。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各领风骚的才人，但在诗、词、文、赋各体中都取得巅峰成就与宗师地位的全能巨匠，则苏轼为古今所仅有。诚如《宋史》本传所言：“浑涵光芒，雄视百代，有文章以来，盖亦鲜矣。”

这样的旷世全才，出现在宋代，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。宋代尤其是北宋，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建设最具有自觉倾向，也是“士”作为政治二元结构中之另一元而最为活跃的时代。一方面，唐在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事业上的灿烂成就，激励着人们跃跃欲试，力求去创新、去超越；另一方面，宋王朝冗费、冗官、冗兵所造成的积弱难返的先天局面，又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不时拉回到现实主义之中。这种以文章、道义兼为己任的时代崇尚，加上特有的才学、经历、思想乃至人格魅力，便为我们民族造就了苏轼这一巨擘。

苏轼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，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（公元1037年1月8日）出生于四川眉山。眉山苏氏，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族谱，为唐代文学家苏味道后裔。苏轼父苏洵，素有深厚的“蜀学”功底，二十七岁时曾改习举业，在屡试不售后重新转回研治六经、百家之说，游学四方，成为著名的散文家与学术家。其突

破儒家正统的纵横家思想与汪洋宏博的文学修养,都给予苏轼以极大的影响。

苏轼自小“奋厉有当世志”,十六岁时,即“学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”。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),二十二岁的苏轼中进士乙科,其试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,感叹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”。嘉祐六年(1061),欧阳修荐苏轼于秘阁,在制科考试中入第三等,为有宋以来获此殊绩的第二人。同年签书凤翔府,于英宗治平二年(1065)回京入判登闻鼓院,又在学士院馆试中入三等,进直史馆。不久因苏洵去世回乡守制,重回京师已是神宗熙宁二年(1068)。时值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,苏轼主张“渐变”,强调“人治”,在政见上与变法派不合,受到了朝廷的推挤。于是,在短期任职判监官告院、权开封府推官后,不得不请求外任。

初入仕途是苏轼人生经历的第一阶段,也是他文学事业的发轫期。在诗歌上,他已有《南行集》的第一部结集,且时时以第一流诗风自期,如著名的《凤翔八观》组诗凌蹊千古,大有“笔所未到气已吞”之雄概。散文也出手不凡,如《喜雨亭记》、《凌虚台记》已绰见大家风度。而其才力、锋芒,更集中表现在制科、策论等政论文上,如《进策》二十五篇、《上神宗皇帝书》等,勃勃英气,力透纸背。“少而锐,中而宏,老而严”,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,便鲜明体现出“锐”的特色。在此前提下所奠立的“知行合一”的文学观,更对苏轼一生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苏轼在杭州担任了三年通判,熙宁七年(1074)调任密州(今山东诸城)知州。又三年,改知徐州。元丰二年(1079),改知湖州。在外放的这八年中,苏轼始终恪尽职守,推行惠民之政,虽对变法持有异议,却尽力“因法以便民,民赖以安”。在杭州,他巡视河工賑济,体察和反映民瘼民隐;在密州,他抗旱抗蝗,吁请朝廷减免赋税;在徐州,他组织军民抗洪,日夜抢险,使“一城生齿,免于漂没”,得到神宗的奖谕。这一阶段,苏轼不但积累了对社会民生的亲身体

验,还实现了入世精神与自然风光的完美结合。饮酒游览,模山写水,促进了他创作灵感与才能的涌动发挥。其诗作如《游金山寺》、《望湖楼醉书》、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、《雪后书北台壁》、《百步洪》等,或清丽流逸,或沉雄豪健,脍炙人口;散文如《超然台记》、《放鹤亭记》、《文与可画筼谷偃竹记》等,胸次洒落,信笔发扬,神理俱足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,才试笔就打破了“诗庄词媚”的传统窠臼,令人耳目一新。其文学创作的个性化风格,在这一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

岂料变生不测,苏轼在湖州上任未滿半年,就遭变法派中的投机分子罗织罪名,摭拾其诗作的片言只语诬为讪谤君上,逮系御史台受审,即历史上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文字狱。苏轼几罹死地,最终以贬充黄州(今湖北黄冈)团练副使结案。元丰三年(1080)苏轼到达贬所,直到七年(1084)三月才诏移汝州。下狱、贬谪的劫难经历,使苏轼对政治与人生进行了全面的反省,在思想上援入了佛、老哲学作为对儒家信仰的补充。旷达虚静,随遇而安,而又桀骜倔强,不改正直的品性、济世的初衷,坦荡堂正,从而形成了苏轼最为世人崇敬的人格魅力。他躬亲农事,耕作东坡,“幅巾芒屨,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”,借天地山川维养其胸中浩然之气,克服了逆境中的政治高压与生活困苦。

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际的第三个阶段,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变化期与丰收期。雄峻、超脱、阔大,成为这一阶段诗词文赋的最鲜明特点,诚如苏辙在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中所言:“既而谪居于黄,杜门深居,驰骋翰墨,其文一变,如川之方至,而辙瞠然不能及也。”这一时期的名作如诗《初到黄州》、《东坡八首》、《题西林壁》,词《念奴娇》(大江东去)、《定风波》(莫听穿林打叶声)、《临江仙》(夜饮东坡醒复醉),文《记承天寺夜游》、《石钟山记》,赋《前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等,都代表了苏轼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。

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),高太后听政,启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

旧党人物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苏轼也被召回朝廷，短期内历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等要职。然而此时他又与“专欲变熙宁之法”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政见不合，在朝中形成所谓“洛蜀党争”，被旧党目为异己，不安于朝，不得不于四年（1089）再度自请离朝，连知杭、颍、扬、定、英等州。尽管苏轼在任上多有惠政，厄运却再度降临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哲宗亲政，重新起用旧党，苏轼再一次成为党争漩涡的牺牲品，重遭诬陷，于次年远谪惠州（今广东惠阳）安置。这是苏轼人生的第四阶段。

第二至第四阶段构成了苏轼创作期“中而宏”的总体特色。这一“宏”字应当这样理解：首先是形式、数量、题材、内容上的宏富，诗词文赋，各擅胜场，信手拈笔，皆成佳制；其次是表现手法上的恣肆，出入百家，熔铸经史，或开或合，变幻多姿；再一点不容忽视的便是涵容深度上的错综，沉郁与超妙，旷放与执着，锤炼与率意，古典与创新，往往都能在苏轼的同一文体乃至同一作品中获得和谐的统一。总之，“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”（苏轼《自评文》语），便是对“宏”字的最形象说明。

苏轼在惠州谪居了三年，却仍然躲不开政敌的继续迫害。绍圣四年（1098）他再贬琼州，被发配到最险恶的海外蛮荒之地儋州（今海南儋县）。此时东坡已六十一岁高龄，无时不在遭受着衰病、饥贫、瘴疠的威胁，甚而一度被驱逐到桄榔林中露宿。然而，凭借着坚强旷达的生活信念，加上友人和当地百姓的关怀慰藉，苏轼坦然自处，“食芋饮水，著书以为乐”，还不忘向黎族百姓传播文化知识和农耕经验。“苦雨终风也解晴”，元符三年（1100）徽宗继位，苏轼于九死一生中终于获得赦还。苏轼的回归，引起了沿途万千百姓的欢贺。然而由于健康受到摧残，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苏轼北归回到常州，终于一病不起。七月二十八日，这位才华横溢的老人溘然长逝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
岭海贬谪构成了苏轼人生的最后阶段，为其文学创作“老而

“严”的终结时期，个性风格表现出向自然古淡的转变。尤其表现在诗歌上，苏轼推崇陶渊明，在逆境中作了一百多首《和陶诗》，追求“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”，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的高远境界。所谓“严”，就是更加娴熟浑成，不离法度而无为律条所束缚，也即是进入化境的代称。

二

南宋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论“近代诸公”诗作：“以文字为诗，以才学为诗，以议论为诗，且其作多务使事。”数句话概括了宋诗的基本特征。这是宋诗不甘徒摹唐诗、受其笼罩而力求自出机杼的创造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引人瞩目的革新与发展。而苏轼即是宋诗风格的奠基者。可以说，正是由于苏诗在扩展诗歌传统疆域上的锐意开拓与成功榜样，激起了有宋文人的宗仰和仿效，才实现了唐诗向宋诗的易帜。

唐诗以情景气韵为标的，即使是叙事说理，也通过寄寓于情景而附带表现。所以唐诗在文字外往往留有大片空白的空间，由读者调动形象思维、会意、联想等手段来完成审美的全程。情景、气韵及这一解读空间，共同构成了唐诗的“诗意”。苏轼并未否定这一传统，不同的是他对解读空间作了进一步的充实，务求扩展诗歌的本象，描摹刻画委曲详尽，达到直接传感的目的。为此，他在诗歌中引入了散文化的叙述手法和结构手段，以议论补充感情，以理趣增饰意象，以才学激领联想。这也就是所谓“以文为诗”，其特色正如苏轼评吴道子画时所论：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”苏诗的“以文字为诗，以才学为诗，以议论为诗”，并未破坏诗歌审美的固有规律，相反增添了作品接近生活原形的艺术特点，更利于全面表达心之所思、目之所睹、身之所历，从而开辟了古典诗歌演进的新径。

具体而言,苏轼诗歌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特色:

一,意象丰满,感情真实。苏轼一生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,可以说首首诗都体现出了这一个性特征。诗人“身行万里半天下”(《龟山》),以多采的文笔描摹各地山川风土、景物名胜,如《巫山》、《出峡》写三峡壮观,《游金山寺》写长江暮景,《新城道中》写村野春色,《望湖楼晚景》写钱塘江潮,《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》写海南风雨等,无不形景如绘,令人如身临其境。诗人宦海浮沉数十年,举凡政治经历、朝政得失、民生疾苦、社会交游,遇事辄书,有感必发,一一驱之笔下,敞开心扉,无丝毫造作之感。他有不少讽喻诗,在充分表现出社会不合理存在的现状的同时,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其应予鞭挞的本质;他又有多首题画诗,除了做到诗中有画,完美再现原作的风貌外,还善于提炼出其中的神理,增强了读者的审美感受。因而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,都在苏诗中得到了形象的开发与反映。

苏诗丰满意象的手段,常常表现在全方位的渲染描述。无论是情景、事件还是感受、心得,正面、侧面、脉络、因果,无不深析透辟,巨细无遗。他在修辞上喜用博喻,即以一连串的比喻施之同一受喻物,犹如舞台上从不同的角度打下多束灯光,被罩住的形象便呈露无遗。如《云龙山观烧得云字》状写野火:“火牛入燕垒,燧象奔吴军。崩腾井陉口,万马皆朱幘;摇曳骊山阴,诸姨烂红裙。”《百步洪》状写洪水:“有如兔走鹰隼落,骏马下注千丈坡。断弦离柱箭脱手,飞电过隙珠翻荷。”这些渲染与比喻自然贴切,意象间又拉开可观的距离,从而达到了神完气足的艺术效果。

二,提炼神髓,注重理趣。于诗歌意境固有的形象思维外,进而添入了逻辑与思辨的色彩。苏轼作诗不仅要求写形,更重于追求得神,他在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》诗中就曾指出: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,定非知诗人。”这种“得神”除了以状物摹形本身来反映外,往往还直接以文字点明,如妇孺皆知的《题西林

壁》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也有的并不说破，却使人咀嚼后憬然会意，如《慈湖夹阻风》：“此生归路愈茫然，无数青山水拍天。犹有小船来卖饼，喜闻墟落在山前。”通过“墟落”与“归路愈茫然”的反映，表现出类似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那种否极泰来的人生哲理。苏轼的理趣诗全然不同于六朝说理谈道的玄言诗，而是兴味盎然，所以他在诗中所不时插入的议论，便有画龙点睛、引人入胜之妙。

三，铺排学问，善于用事。苏轼使事用典的娴熟、广博、工巧、灵活，是有口皆碑的。后人所评“世间故实小说入手便用，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”（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），“辞源如长江大河，飘沙卷沫，枯槎束薪，兰舟绣鹢，皆随流至”（许颢《彦周诗话》），都反映出苏轼的这一特色。如《重寄孙侔》云：“蒋济谓能来阮籍，薛宣真欲吏朱云。”孙侔为王安石老友，王安石入相，他坚辞不出，苏诗连用了两个不应故人聘召的古贤典故，歌赞了孙侔的操守。又如《题文与可墨竹》：“谁云生死隔，相见如龚隗。”晋人隗照临终前留下书版，遗嘱五年后交由龚姓友人发视；文与可所绘这幅墨竹，也曾预嘱定要留待苏轼题跋，结果在他歿后八年终得实现。这些典故切合诗中题事，犹似天造地设。东坡的许多酬赠诗，还做到了句句用典，而每一典故都切合受赠者的姓氏，后人惊叹谓：“自非博极群书，足供驱使，岂能左右逢源如此！”（赵翼《瓯北诗话》）苏轼以才学为诗，大量运用贴切的典故、成语，起到了增加色泽、增加深度、增加暗示力、增加观念启示性的艺术效果，以精炼的词语空间，容纳了丰富的信息与隽永的余韵。

四，章法奇警，夭矫自如。苏诗布局不拘一格，能开能合，或而珠走玉盘，或而旁搜远引，直如天马行空，驱遣灵妙。而其布局经营又不同于江西诗派的刻意斧凿，一切出于自然。这样的例子在苏轼中指不胜数，这里只要随意拈取一首素不为人注意的小诗，便可领略一二：“有客叩我门，系马门前柳。庭空鸟雀散，门闭客立久。主

人枕书卧，梦我平生友。忽闻剥啄声，惊散一杯酒。倒裳起谢客，梦觉两愧负。坐谈杂今古，不答颜愈厚。问我何处来？我来无何有。”（《和陶拟古》）忽客、忽主，忽梦觉、忽梦前，忽惊、忽喜、忽愧，令人应接不暇。更奇在末尾忽作一问一答，语皆匪夷所思，而主人的襟怀、境遇，都在两句中传神地表现出来。

王国维《文学小言》：“宋以后之能感自己所感、言自己之言者，其惟东坡乎！”“感自己所感，言自己之言”十字，可谓是苏诗也是宋诗风貌的最为本质性的概括，欣赏苏诗正应由此契入。

三

词分婉约、豪放两体，苏轼是豪放词的开创人和代表者，这种观点在文学史上很有影响。俞文豹《吹剑录》把柳永的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派给妙龄女郎浅拍低唱，而须关西大汉铜琵琶、铁绰板，来歌东坡的“大江东去”，就很典型地道出了个中的区别。当然豪放与婉约之间并无明确的界线，词人尤其是多产词人也不可能只拥有单一的风格特色，不过胡寅《酒边词序》的一则评论，却确实能反映出苏轼在宋词领域中里程碑式的开拓贡献：

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。于是《花间》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。

婉约与豪放主要是就风格而言的，但首先与题材内容直接有关。在传统的观念中，词以表现舞筵歌场、闺情离思的内容为正体，而苏轼则率先在扩充词的境域上求新求变，所谓“以诗为词”，凡能写进诗的社会和生活题材，举凡登览、怀古、咏史、咏物、游猎、感遇、悼亡、壮行、农村生活、田园风光等，无不摄入笔端，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（刘熙载《艺概》）。这种意象的扩大，冲破了传统词境封闭的围制，将词体提高到与诗言志抒情的同等文学地位，使人

自然而然地对苏词产生出“曲子中缚不住”的感想来。

同词体的解放相配合，苏轼雄驰的感情与健拔的笔力也一新天下耳目。我们拿“大江东去”与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相比，就很容易看出在宣泄力度上的不同；而如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（《念奴娇》）、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（《江城子》）等，都不止是寻常的夸张，而是奇情豪气的自然发露。东坡词“曲终，觉天风海雨逼人”（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）的印象，即在于此。又因为“以诗为词”，于是在倾入自我、表现个性的时候，直截快当，并且不辞采用议论语、经籍语及常用口语入词，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、“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闲处看”（《沁园春》）等，造出有棱有角的效果。后起的词人运用词体抒写豪纵淋漓的意象与情怀，正是接受了苏轼词作的引导。

所以将苏轼尊为豪放词派的开山祖师与词体解放的第一功臣，是顺理成章的。在东坡的豪放词中，以《念奴娇》（大江东去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明月几时有）为最脍炙人口的代表。前人谓震撼耳目，以《念奴娇》为冠；沦浹肌髓，推《水调歌头》为首，洵非虚言。东坡的豪放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：它们都努力使精神升华进入一种崇高、宽广的境界，以抵制人生的缺陷，激励命运的抗争，从而体现出儒家积极进取的主导倾向。

豪放词是苏词成就中最为人瞩目之所在，但在东坡的全部词作中，仅占很小的比重，也就是说，苏轼在词体创作中也是全能的。他有大量的婉约词，格调却显得高远典雅，真诚健康，起到了将以秾艳为主的婉约词领挈至向上一路的积极作用。更有大量的作品不易简单归类，其间或清丽，或韶秀，或清空，或旷达，常能“寄深于浅，寄厚于轻，寄劲于婉，寄直于曲，寄实于虚，寄正于余”（刘熙载《艺概》）。东坡以其传世的三百余首词作，为宋代词坛的百花齐放提供了全方位的表率 and 借鉴。

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对于宋词体制的贡献。唐五代词多为小令，

而苏轼是宋初大量制作长调的先行者之一，后世甚而将《贺新郎》、《戚氏》等词牌的创制权寄于其名下。长调在篇章结构、摘词敷采上需要更多的手法与技巧，而苏轼则往往能自如地将诗、文、论、赋的匠法运用于其中。从他櫟括韩诗陶赋入词，酒筵间作百字以上长调，“随声击节，歌竟篇就”等例子来看，可知东坡度曲实有极高的造诣；但他并不斤斤于囿守音律，为了表意的需要，敢于在格律或句读上作大胆的调整。世人有的因而讥评为“句读不葺之诗”，其实并不符合事实。工匠以创造突破为快而不以随俗守成为乐，苏轼作词便属于这样的类型。

四

唐代古文运动与宋代古文运动之间，存在着一个浮靡回潮——矫枉务僻的曲折反复。欧阳修力革陈弊，开辟了平易晓畅的新风。苏轼继往开来，既保留了欧阳修婉曲闲易的特长，又增加了变化流转；既继承了韩愈缜密劲奇的传统，又避免了深奥艰涩，从而成为“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的集大成者。苏轼散文的风格，诚如其自言：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。”（《答谢民师书》）“意之所到，则笔力曲折，无不尽意。”（见《春渚纪闻》）自然与匠意实现了完美的结合。后人谓古文“自秦以下莫盛于宋，宋之文莫盛于苏氏”（宋濂《文原》），可谓的评。

苏轼的议论文，析理透辟，谈锋锐利，广征博引，腾挪跌宕，兼有《孟子》、《国策》、陆贽、贾谊之风。他的史论，如《留侯论》、《范增论》、《贾谊论》等，都能于史料的表象间独具只眼，翻新出奇，兼以豪语快字，凌纸骋发，令人击节惊叹。如《留侯论》不言张良的睿智奇谋，却单从一个“忍”字入手，将博浪椎秦、圯桥进履、郑伯克段、勾践灭吴等互不干连的事件一以贯之，进而表现出张良“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”的过人处，以此作为其扬名青史之本，可谓发千

古人所未发。他的政论,更是识见超卓,切中时弊,兼以条分缕析,引类比喻,成为后世文人仿效的楷模,尊为“苏氏家法”。有无相生,奇正互倚,显隐交呈,虚实代替,疾徐错行,顺逆乘除,若无意而意合,若无法而法随,构成了苏轼议论文汪洋恣肆、多姿多采的风景。

苏轼在记叙文上的成就,更是为人所称道。无论是游记、志胜还是碑传集序,往往都能同时体现出三大特色:一是寓理、寓情、寓气、寓识,旷怀达识、至理深情面面俱到;二是以诗为文,意境语言都有意识地力求诗化;三是章法上不拘故常,极尽变化,既顺畅自然,又力摒平板。如《喜雨亭记》,全篇述亭本体,仅“为亭于堂之北,而凿池其南,引流种树”十五字,而以重点围绕“喜”、“雨”二意点染生发。其间记叙、议论、抒情交相参用,直叙、倒写、对话、歌咏穿插布置,“雨”从“不雨”、“乃雨”、“又雨”至于“大雨”,“喜”从古、今、小、大、因、果层层出之,气脉畅足而跌宕,最终突出久旱得雨的喜悦,表现了关心稼穡、与民分忧的强烈思想感情。得心应手,触处生春,给人以散文诗式的充分艺术享受。

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间的文体,苏轼则兼取诗、古文与古赋的长处,将诗情、画意、妙理融为一炉。他在黄州写成的前、后《赤壁赋》,既有汉赋的铺排格局,又有古文的飘洒流走,更有诗化的情韵意境,骈散结合,排宕飞动,记事、写景、抒情、怀古、议论,令人如行山阴道上,目不暇接。其感情神韵、艺术境界,可说是达到了化工的地步。

小品文和杂文也是东坡散文中风韵宛独的妙品,包括书札、序跋、随笔、寓言等,短小精悍,而具见性灵。文字间体现了苏轼丰富的思想、坦荡的襟怀和幽默的个性,而且往往参合着禅意,令人回味无穷,会心于可言与不可言之间。例如《书若逵所书经后》:

怀楚比丘,示我若逵所书二经。经为几品,品为几偈,偈为几句,句为几字,字为几画,其数无量。而此字画,平等若一,无有高下轻重大小。云何能一?以忘我故。若不

忘我，一画之中，已现二相，而况多画？如海上沙，是谁磋磨？自然匀平，无有粗细。如空中雨，是谁挥洒？自然萧散，无有疏密。……

虽形似谈禅，却沟通了艺术与人生哲理之间的联系，洞见了作者洒然出尘的胸次。

明人王舜俞指出：“文至东坡，真是不须作文，只随笔记录便是文。”（《苏长公小品眉批》）苏轼的散文，确实达到了指挥如意、炉火纯青的最上乘境界。

五

苏轼的诗集、词集、文集，自宋以来，其编纂或注评的版本不下数十种。今人孔凡礼先生的《苏轼诗集》、《苏轼文集》，则体现了现代苏集整理的高度成就。但各种评注本、整理本卷帙浩大，庋藏不易。为便于读者阅读需要，我们重新标点，将苏轼的全体诗、词、文汇为一帙。其间诗集以嘉庆二十四年刊本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为底本，词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《词林集珍·东坡乐府》为底本，文集以《东坡先生全集》清刊本为底本，对少量明显的错讹字则径行作了改正。

傅成 穆倩

一九九九年九月

诗集卷一

古今体诗四十首

郭纶 纶本河西弓箭手，屡战

有功，不赏。自黎州都监官满，贫不能归。今权嘉州监税。

河西猛士无人识，日暮津亭阅过船。路人但觉骢马瘦，不知铁槊大如椽。因言西方久不战，截发愿作万骑先。我当凭轼与寓目，看君飞矢集蛮毡。

初发嘉州

朝发鼓阊阖，西风猎画旗。故乡飘已远，往意浩无边。锦水细不见，蛮江清可怜。奔腾过佛脚，旷荡造平川。野市有禅客，钓台寻暮烟。相期定先到，久立水潺潺。是日，期乡僧宗一，会别钓鱼台下。

犍为王氏书楼

树林幽翠满山谷，楼观突兀起江滨。云是昔人藏书处，磊落万卷今生尘。江边日出红雾散，绮窗画阁青氛氲。山猿悲啸谷泉响，野鸟嘒戛岩花春。借问主人今何在？被甲远戍长苦辛。先登搏战事斩级，区区何者为《三坟》。书生古亦有战阵，葛巾羽扇挥三军。古人不见悲世俗，回首苍山空白云。

过宜宾见夷中乱山

江寒晴不知，远见山上日。朦胧含高峰，晃荡射峭壁。横云忽飘散，翠树纷历历。行人挹孤光，飞鸟投远碧。蛮荒谁复爱，秣秀安可适。岂无避世士，高隐炼精魄。谁能从之游，路有豺虎迹。

夜泊牛口

日落红雾生，系舟宿牛口。居民偶相聚，三四依古柳。负薪出深谷，见客喜且售。煮蔬为夜飧，安识肉与酒。朔风吹茅屋，破壁见星斗。儿女自咿嚶，亦足乐且久。人生本无事，苦为世味诱。富贵耀吾前，贫贱独难守。谁知深山子，甘与麋鹿友。置身落蛮荒，生意不自陋。今予独何者，汲汲强奔走。

牛口见月

掩窗寂已睡，月脚垂孤光。披衣起周览，飞露洒我裳。山川同一色，浩若涉大荒。幽怀耿不寐，四顾独彷徨。忽忆丙申年，京邑大雨雾。蔡河中夜决，横浸国南方。车马无复见，纷纷操筏郎。新秋忽已晴，九陌尚汪洋。龙津观夜市，灯火亦煌煌。新月皎如昼，疏星弄寒芒。不知京国喧，谓是江湖乡。今来牛口渚，见月重凄凉。却思旧游处，满陌沙尘黄。

戎州

乱山围古郡，市易带群蛮。瘦岭春耕少，孤城夜漏闲。往时边有警，征马去无还。自顷方从化，年来亦款关。颇能贪汉布，但未脱金钗。何足争强弱，吾民尽玉颜。

舟中听大人弹琴

弹琴江浦夜漏永，敛衽窃听独激昂。风松瀑布已清绝，更爱玉

珮声琅琅。自从郑卫乱雅乐，古器残缺世已忘。千家寥落独琴在，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。世人不容独反古，强以新曲求铿锵。微音淡弄忽变转，数声浮脆如笙簧。无情枯木今尚尔，何况古意堕渺茫。江空月出人响绝，夜阑更请弹《文王》。

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到晚不及见复来

江上有微径，深榛烟雨埋。崎岖欲取别，不见又重来。下马未及语，固已慰长怀。江湖涉浩渺，安得与之偕。

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 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

其 一

天师化去知何在，玉印相传世共珍。故国子孙今尚死，满山秋叶岂能神。

其 二

真人已不死，外慕堕空虚。犹馀好名意，满树写天书。

渝州寄王道矩

曾闻五月到渝州，水拍长亭砌下流。惟有梦魂长缭绕，共论唐史更绸缪。舟经故国岁时改，霜落寒江波浪收。归梦不成冬夜永，厌闻船上报更筹。

江上看山

船上看山如走马，倏忽过去数百群。前山槎牙忽变态，后岭杂沓如惊奔。仰看微径斜缭绕，上有行人高缥缈。舟中举手欲与言，孤帆南去如飞鸟。